

論蔣中正對膠東之戰的處置（1932）

蘇聖雄

摘要

膠東之戰為1932年9月至11月間發生於山東省東部之內戰，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出兵攻擊駐紮於膠東的第二十一師師長劉珍年。目前學界鮮少論述該戰事之專著，相關記述，多為文史資料式的回憶性文章，或附屬於膠東之戰主角之一韓復榘的相關作品中，錯漏難免，且稍有不足。是以本文整理國史館典藏之《蔣中正總統檔案》、《國民政府檔案》、《閻錫山檔案》，及相關人員的回憶、日記等史料，聚焦於此內戰，尤其扣緊是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對此地方事變的處置，期望對蔣之態度、決策，乃至於民國時期中央與地方之關係，做一補充。

本研究指出，蔣中正在事發之初，對韓、劉無所偏倚，先求調查清楚，並有徵詢要員、加派情報人員、集中軍隊、安撫劉珍年等相應布置。此外，蔣派員製造輿論，期望以此壓迫韓復榘停止軍事行動。在戰況愈趨明朗之後，蔣對劉請其忍讓，對韓則軟硬兼施；一來請韓顧全大局，停止內戰，一來以軍委會名義嚴令停戰撤兵，靜待中央派員調查。9月底，韓復榘停戰，情勢似有轉圜，蔣處置方針趨向退讓，然韓以目標未達故無法接受中央方案，雖一度停戰，是後仍展開更大規模之攻勢。蔣對調停膠東之戰，原有相當把握，但受限於內政、外交、剿匪等諸項事務，尤其正值國聯報告書發表，輿論要求一致對外，故無法強硬介入戰事，也無意武力解決，只得竭力忍受。於是在中央保證劉珍年部調走之前提下，韓復榘停戰撤兵。膠東之戰便以韓復榘得遂行其驅逐劉珍年、獨霸山東之目標告終。

考察此戰，可知蔣非窮兵黷武之人，其運用手段（調停、輿論、分化

等)，考量亦廣，未迷信武力。此戰對蔣、韓關係及華北局勢，也有深遠影響，值得論者留意。

關鍵詞：膠東之戰、韓復榘、劉珍年、蔣中正、山東

Study on Chiang Kai-Shek's Disposal of the Jiaodong War, 1932

Sheng-Hsiung Su*

Abstract

The Jiaodong War is a civil war taking place in east Shandong Province between September and November, 1932. The belligerents are Han Fujū (韓復榘), Chairman of the Shand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and Liu Zhennian (劉珍年), Commander of the 21st Division. Few academic researches dealt with the the history of this war can be found today, therefore we may only refer to related memoirs and works on Han Fujū. Some clerical errors, therefore, are unavoidable.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fact of the war, this article excerpted materials from the Academia Historica in Taipei, including Archives of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蔣中正總統檔案》), Archives of Nationalist Government (《國民政府檔案》), and Archives of Yan Xishan (《閻錫山檔案》). Memoirs and diaries of figures related to this war are also consulted as supplements. In these materials, how Chiang Kai-Shek, the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Military Council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t that time, coped with this event, is also narrated in detail to help us learning from Chiang's attitude toward this war; some archives even illust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during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period.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Chiang did not support either side of the belligeren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instead, he investigated the whole case before committing himself to this conflict. On one hand, Chiang tried to appease Liu Zhennian; on the other hand, he put pressure on Han Fujū with public opinions, trying to reach an agreement of a truce with belligerents. Meanwhile, Chiang even assembled the troops and asked important officials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for advices.

When the situation was much clear, Chiang changed his attitude toward the war; he tried to persuade Liu to make a concession and became tougher towards Han. In the name of National Military Council, Chiang ordered Han to cease fire and forced Han's army to retreat. Chiang was so confident about his ability to mediate the war that he ignored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s behind. Han accepted Chiang's order ostensibly but later launched a comprehensive, broad-scaled attack. Limited by diplomacy, politics, and encirclement campaign against communist troops during the war, Chiang was attacked front and rear at this moment; he could not insist on his original order anymore and had to put up with the chaos caused by the war. Finally, aft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greed to transfer Liu out of east Shandong Province finally, Han promised to retreat and achieved his goal to occupy the whole territory.

As we can see, Chiang was not totally believing in military forces; instead, he was manipulative and employed tricks whenever necessary. Instead of using military strength, which was obviously more powerful than Han's, Chiang chose to solve the problem by means of reconcili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and was also aware of using the pressure of public opinion to suspend the war.

Recognizing Chiang's attitude toward the Jiaodong War, especially toward Han, helps us not only to know more about the political governance of Chiang, but also to underst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North China.

Keywords: Jiaodong War, Han Fujun, Liu Zhennian, Chiang Kai-Shek, Shandong

論蔣中正對膠東之戰的處置（1932）*

蘇聖雄**

壹、前言

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為民國史研究之重要課題，自清末太平軍起事以還，歷經諸多歷史大事，如回變、捻變、東南互保、辛亥革命、護國運動等等，外重內輕之局逐漸為常態，並於北京政府統治時期（1916-1928）最為顯著。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後，中央欲收束地方權力，發生大小戰事，其中以中原大戰（1930）為最。戰後中央與地方關係仍未獲調和，寧粵分裂（1931）、福建事變（1933）、兩廣事變（1936）等等大規模政治動盪相繼發生，而小規模的地方衝突不斷，如山東韓復榘、劉珍年之戰（1932）；四川二劉（劉湘、劉文輝）之戰（1932-1933）；貴州王家烈、毛光翔之戰（1932）；孫殿英與馬家軍之戰（「拒孫之役」，1934）等等。

其中山東韓復榘與劉珍年之戰，又稱膠東之戰，為1932年9月至1932年11月間發生於山東省東部之內戰。交戰雙方為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及盤踞膠東的第二十一師師長劉珍年。是時日本侵華加劇，九一八事變（1931）方滿一年，國際聯盟調查此一事件，報告書將次發表。值此國家應共同抵禦外侮之時，內戰發生格外令中外矚目，中央也因此必須介入調停。目前學界鮮少論述該戰事之專著，¹ 相關記述，多為文史資料式的回憶性文章，或附屬於膠東之戰主角之一韓復榘的相關作品中，錯漏難免，且稍有不足。是以本文整理相關史料，聚焦點於此內戰，尤其扣緊是時「中央」軍事最高領導人蔣中正對此「地方」

* 本文承蒙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修改期間獲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獎助，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10年9月14日；通過刊登日期：2011年5月13日。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¹ 目前筆者蒐羅到者，僅有黃偉，〈論1932年山東「韓劉衝突」的制約因素〉一文，收入《民國檔案》，2008年第4期（南京），頁82-88。

事變的處置，期望對蔣之態度、決策，乃至於民國時期中央與地方之關係，做一補充。

在資料的引用方面，以國史館典藏之《蔣中正總統檔案》（蔣中正檔）為主，該檔案收錄蔣與各方往來之電文、情報，足以呈現蔣之措置及歷史實況。並輔以亦收藏於國史館之《國民政府檔案》、《閻錫山檔案》，及相關人員的回憶、日記等，以期論述更為完整。章節安排方面，前言不論，第二章為給予讀者對此戰事之基本認識，稍離主題（蔣中正的處置），而進行背景交代。接著第三、四章，以戰事發展為經，蔣之處置為緯，依時序先論述「戰事初期蔣之肆應」，復論後期蔣面臨「處置的兩難：武力解決抑或竭力忍受」，最後再以第五章作結。

貳、膠東之戰的背景

韓復榘（1890-1938），字向方，原為馮玉祥部重要將領，蔣桂戰爭（1929）之後，韓部投向中央，任河南省政府主席。中原大戰期間（1930），駐軍山東，任山東省政府主席、第三路軍總指揮。² 劉珍年（1898-1935），³ 字儒席，原為東北軍張宗昌部團長，1928 年春，國民革命軍北伐，張宗昌戰敗北撤，劉珍年於膠東率所部投向南京中央，自稱國民革命軍暫編第一軍軍長，戰後國軍縮編，任新編第三師（後改稱第二十一師）師長。⁴

² 呂偉俊，《韓復榘》（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 年），頁 6-49、72-83；姜克夫編著，《民國軍事史略稿》（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頁 114。

³ 劉珍年生年有 1898、1897 年兩說，雖確屬狗、農曆戊戌年生，但月日不詳，故西元紀年難以確定。參見趙延慶，〈近代軍閥中的奇特人物——劉珍年〉，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以下簡稱山東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 30 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232。

⁴ 王程遠，〈張宗昌與劉珍年年平城區之戰〉，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煙台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煙台文史資料》，第 4 輯（煙台：編者印行，1985 年），頁 39-40。關於膠東之戰前的劉珍年，尚可參見劉一青，〈憶說膠東王劉珍年〉，《中外雜誌》，第 29 卷第 5 期（1981，臺北），頁 94；于翔麟，〈民國人物小傳：劉珍年〉，《傳記文學》，第 55 卷第 2 期（1989，臺北），頁 143。劉珍年部建置之變遷，可參見劉鳳翰，《戰前的陸軍整編——附九一八事變前後的東北軍》（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1992 年），頁 191-192。

劉珍年在國民革命軍北伐以後掌控膠東軍、政大權，統治膠東近五載，有「膠東王」之稱，⁵ 難為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所忍受。進一步言之，膠東之戰的爆發，可由遠因、導火線、韓動武考慮進行述說。⁶

一、遠因

膠東之戰發生的遠因，一因劉為韓心腹之患，另一為財政問題。關於前者，劉珍年駐軍煙台及膠東蓬萊、福山、黃縣、招遠、棲霞、文登、掖縣、萊陽、牟平、海陽、榮城、平度等 12 縣，下轄一定數量的部隊。以韓來說，劉之轄區為獨立王國；劉對縣長之任免，悉出己意，置上級省府於不顧，甚至企圖與復興社特務劉子建密議分化韓復榘部屬，為韓獲知，故韓視劉為心腹之患，意欲除之。⁷ 關於後者，膠東為魯省富庶之區，又有海口，⁸ 故收入頗豐，每月扣除開支，尚餘百餘萬元。劉在轄區自行收稅，送繳南京及自用，不解省府。韓因之曾向劉提議三項，要求每月向省府解款 50 萬元、撥 5、6 縣歸省府管理、交還各縣統稅局，稅收歸財政部徵收。劉對此置之不理，韓十分氣憤不滿。⁹ 韓復榘戰前曾至泰山請教馮玉祥，謂：「〔山東財政狀況〕只能自給，沒向中央要錢。膠東比較富足，劉珍年霸占了膠東地區 15 個縣，縣長、局長都由他委派，稅收由他把持，一切都不能統一」，¹⁰ 乃欲將膠東富庶區收歸已有，財政自可

⁵ 李正言，〈劉珍年獨霸膠東〉，收入《煙台文史資料》，第 3 輯（煙台：編者印行，1984 年），頁 137-149；李扶漢，〈北洋軍閥膠東王劉珍年〉，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政人物·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 年），頁 325。

⁶ 以下主要依據當時情報人員陳世愚呈給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之意見，並略作補充。參見「陳世愚呈蔣中正魯變原因考察及軍力戰況分析」（1932 年），〈地方團隊（一）〉，特交檔案—分類資料—軍事，《蔣中正總統檔案（以下簡稱《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2105001。

⁷ 紀慧亭，〈韓復榘主魯政聞〉，收入山東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 14 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171-172；趙延慶，〈近代軍閥中的奇特人物——劉珍年〉，頁 224；呂偉俊，〈韓復榘〉，頁 91-93。

⁸ 韓洞，〈膠東之戰〉，收入山東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一代梟雄韓復榘》編輯組編，《一代梟雄韓復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 年），頁 139。

⁹ 《大公報》，天津，1932 年 9 月 18 日，版 3；《申報》，上海，1932 年 9 月 20 日，版 8；呂偉俊，〈韓復榘〉，頁 92。

¹⁰ 王贊亭，〈馮玉祥兩次隱居泰山見聞片段〉，收入山東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

裕如。

二、導火線

中央撥軍餉過程發生問題，為韓、劉之間爆發戰事之導火線。¹¹ 韓、劉在 8 月間曾對軍餉問題發生嚴重爭執。南京中央應允每個月給山東軍隊協餉 60 萬元，¹² 原先預定劉軍之軍餉月撥 15 萬元，韓有意減為 12 萬元，往返磋商之後，劉以讓至 14 萬 5 千元為最低限度。韓認為劉有意侮辱，怒不可遏，戰事隨即在 9 月爆發。是以此戰爭亦可視為韓復榘、劉珍年間的權力、意氣之爭。戰事發生後，在濟南的中央軍事聯絡人蔣伯誠便謂：「韓復榘意在解決劉珍年部，但目前尚為權力、意氣之爭。」¹³

三、韓動武考慮

膠東之戰爆發有如上所述之遠因、近因，至於韓復榘動武之考慮，概有時機、張學良之動向、兵力等。

就時機言之，當時國民政府內政、外交問題不斷。九一八事變後，國府寄望於國際聯盟，進行一連串外交努力，¹⁴ 壓力甚重，民眾輿論趨向全國一致抗日禦侮。¹⁵ 國內政治方面，蔣中正、汪兆銘雖再度合作，以「蔣主軍、汪主政」

史資料選輯》，第 10 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 年），頁 94。

¹¹ 《大公報》，天津，1932 年 10 月 8 日，版 4；《申報》，上海，1932 年 9 月 21 日，版 9。

¹² 呂偉俊，《韓復榘》，頁 93。一說協餉 50 萬，國聞週報社輯，《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第 9 卷第 38 期，頁 7，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3 編第 7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 年），頁 4077。

¹³ 「蔣伯誠電蔣中正謂韓復榘意在解決劉珍年部但目前尚為權力意氣之爭」（1932 年 10 月 20 日），〈民國二十一年（八）〉，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60064。

¹⁴ 膠東之戰期間中國代表團在國際聯盟的努力，可參見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二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56-103。

¹⁵ 黃偉，〈論 1932 年山東「韓劉衝突」的制約因素〉，頁 82-88。

之模式領導國家，¹⁶ 但仍貌合神離，互不信任；¹⁷ 兩廣在國民黨元老胡漢民的號召下，亦猶如獨立王國。¹⁸ 其他各地，各種政治勢力夾雜，中央動見觀瞻。¹⁹ 當時韓復榘甚為輕視劉珍年軍隊，乃希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將劉解決，迨中央與各方知悉，膠東已入掌握，想亦莫如之何。²⁰ 且即便劉珍年在魯，或為蔣中正為牽制韓復榘之布置，²¹ 然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將次發表，韓判斷中央顧及國際視聽，決不致擴大內戰，不利於彼，故認為此乃短時期併吞劉珍年之千載難逢機會。

以張學良之動向言之，東北軍領袖張學良是時負責華北軍政，為華北最具實力的軍政領袖，其態度對韓、劉之爭十分重要。是年夏天，韓親赴北平與張學良晤談，韓、張首次見面，有記載指出當時張笑著對韓說：「大叔！咱倆人是不打不相識啊！」（指北伐時在彰德的戰事，張、韓恰為對手）韓聽張此說，也為之大笑不已；張見韓在北平無住宅，遂將絨線胡同一棟大宅（有一百多間房間）送給韓。²² 韓此行結果頗為良好，故料想若能於短時間內解決劉珍年，張學良方面當無問題。

就兵力言之，韓復榘全部兵力共約 77,000 餘人，戰事發生後，韓軍不計民團，調動兵力約 25,000 員，約全部三分之一。以曹福林師及雷太平手槍旅之一團為主力，尚有騎兵獨立旅、喬立志師之馬貫一旅及展書堂師之一旅，當中器

¹⁶ 許育銘，《汪兆銘與國民政府——1931 至 1936 年對日問題下的政治變動》（臺北：國史館，1999 年），頁 91-93、163-181。

¹⁷ 陳公博，《苦笑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 年），頁 209-210。

¹⁸ 陳紅民，〈胡漢民·西南政權與廣東實力派〉，《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37 卷第 1 期（2007，杭州），頁 19-27。

¹⁹ 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八到七七》（臺北：國史館，1995 年），頁 367。

²⁰ 王贊亭，〈馮玉祥兩次隱居泰山見聞片段〉，頁 94。

²¹ 馮玉祥因此認為，韓劉之戰為蔣中正造成：「蔣之計劃在彼此牽制，他從中取利。如山西之宋、孫駐軍以制閻。如江蘇，如河南，如山東，均用此法，亂國即在於此矣。外侮如此之深，失地如此之多，民權之剝奪，財政之紊亂，自相殘殺，日日欺人等，如此尚為此相互監視之法，誠可恨之至。」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 3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1932 年 9 月 19 日記事，頁 692-693。

²² 高蘭，〈韓復榘生平事略〉，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青島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 2 輯（青島：編者印行，1982 年），頁 18。

械以手槍旅之一團器械最精，曹福林部次之，喬師之馬旅的槍械最複雜，另有飛機 6 架。分爲東西兩路，韓自任西路指揮，曹福林任東路指揮。劉軍則有步兵三旅（獨立旅在內），騎、砲各一團，工兵、輜重、特務各一營，總數不及 2 萬人（民團亦不計）。各旅之器械均甚齊整，砲兵團除山砲之外，尚有野砲數門。以器械論，不亞於韓軍。劉軍兵力不及韓，且難以補充，又無飛機，遂爲韓判斷能短時間解決之依據。²³

於是在 1932 年 9 月 17 日的夜晚，以上述種種因素爲背景，韓復榘對劉珍年發動攻擊，膠東之戰遂爆發。

叁、戰事初期蔣之肆應

一、外部考量與事初布置

9 月 17 日夜，韓復榘、劉珍年雙方衝突開始，18 日拂曉起，在平度、掖縣附近正式開戰。²⁴ 而 17 日晚間，中央軍事最高領導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已收到膠東之戰爆發之消息，²⁵ 自記曰：

際此倭寇狂逞，共匪毒螫，而韓復榘乃進攻劉珍年。汪兆銘以退為

²³ 數據依據「陳世愚呈蔣中正魯變原因考察及軍力戰況分析」（1932 年），〈地方團隊（一）〉，特交檔案—分類資料—軍事，《蔣中正檔》，典藏號：002080102105001。呂偉俊指出劉珍年「下轄 3 旅（第 1 旅、第 2 旅及獨立旅）、4 團（騎兵團、炮兵團、教導團及特務團）、2 營（工兵營、輜重營），約 3 萬人。」氏著，《韓復榘》，頁 91-92。未見徵引來源，故兵力數據筆者暫依陳世愚呈蔣中正之報告。至於民團數目，膠東之戰後，韓復榘重新整編山東省境內民團為五路，前四路為韓原有者，兵力 10,838 員，第五路為驅逐劉珍年後成立者，兵力 1,376 員。或可以此概推膠東戰時韓、劉之民團數目。參見劉鳳翰，《國民黨軍事制度史》，下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 年），頁 965。劉書關於韓復榘第三路軍之兵力，係參考呂偉俊書，故筆者暫不採用。戰事爆發時，報紙亦誌有兩軍兵力，以來源不明，且各報間、同報異日間數字皆不相同，故亦不採用。

²⁴ 國聞週報社輯，《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第 9 卷第 38 期，頁 6。

²⁵ 「周拯電蔣中正劉珍年與韓復榘部在昌邑平度間接觸」（1932 年 9 月 17 日），〈民國二十一年（三）〉，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檔》，典藏號：002080200055156。

進，欲有所要脅，西南胡蕭又蠢蠢欲動。嗚呼！人心麻木，習尚腐敗，自出室門一步，凡所聞所見，無不令人愧憤！是社會與政治之人士，一言一動皆奴隸之不若，亡國象徵滿眼皆是，必如何乃能使我民族可趨於自由平等之域也？余已髮鬢加白，焦灼何如？²⁶

據此吾人可得知蔣當時關懷之事有四，一為日本進犯，二為共黨問題，三為汪兆銘「以退為進」、「有所要脅」，四為胡漢民與西南問題。這些對蔣處理戰事必有一定影響，可視為「外部考量」，故本文稍事敘述。關於其一，此指九一八事變以來日軍不斷之軍事行動，膠東之戰發生 2 個月前，熱河淪陷。而此項尚可與第三項合而觀之，時任行政院長的汪兆銘，便以統籌華北軍事的「軍閥」張學良於日軍進攻熱河未先抵抗，卻迭向中央催請巨款，通電嚴厲指責張氏作風，辭職離京赴滬。此舉造成朝野震動，張氏亦請辭。蔣竭力慰留，但汪不為所動。²⁷ 以上政潮之發生，乃有蔣此時認為的汪「以退為進」、「有所要脅」。關於其二，中原大戰結束後，蔣將注意力轉移至中共，於 1930 年 12 月 9 日在南昌召集剿匪軍事會議，確定「第一次圍剿計畫」，²⁸ 並成立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統一指揮贛省剿匪軍事。²⁹ 此後歷經 3 次圍剿，皆徒勞無功。1932 年 5 月 24 日，國民政府復派蔣中正為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³⁰ 蔣氏謂：「根本清剿掃除赤氛以整理善後，贛省已令何應欽負責矣，而豫鄂皖三省非余躬自親理不可。」³¹ 是膠東之戰爆發時，蔣主要將心力投注於指揮豫鄂皖三省剿共軍事行動，乃稱此際「共匪毒螫」。關於其四，自蔣中正軟禁胡漢民於湯山後，³² 寧

²⁶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16—民國 21 年 8 月至 9 月》（臺北：國史館，2004 年），頁 439-440。

²⁷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2（臺北：出版者不詳，1978 年），頁 214-221。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乃於 8 月 25 日做出決議，以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長職務，並繼續促汪復任。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八到七七》，頁 98-101。

²⁸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 年），頁 111。

²⁹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2，頁 78-79。

³⁰ 國民政府秘書處編輯，《國民政府公報》，第 39 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72 年），洛字第玖號，中華民國 21 年 5 月 31 日。

³¹ 吳淑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14—民國 21 年 4 月至 5 月》（臺北：國史館，2004 年），1932 年 5 月 23 日記事，頁 480。

³² 此事背景可參見楊天石，〈約法之爭與蔣介石軟禁胡漢民事件〉，收入氏著，《蔣氏

粵分裂，雖因九一八事變共赴國難，雙方息爭禦侮，但自此中央號令難及兩廣，寧粵互不信任，³³ 乃至於蔣認為兩廣領袖胡漢民（及蕭佛成）「蠢蠢欲動」。

9 月 18 日，韓復榘向各界通電，說明其攻擊劉珍年之原因：

竊劉師長珍年駐防魯東，已歷五年……詎料前據密報，該防區內土匪有各股聯合於九月一日暴動之說。及派員馳往偵察，並非土匪聯合，乃係一般民眾苦於該部敲剝，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誓將犧牲身家性命，合力驅逐，不與兩立……該師長駐紮期間……民困弗知，時艱弗恤，只圖苛歛民財，充其囊橐，而區內土匪，肆行無忌，充耳弗聞……查該師長盤據魯東，豺狼成性，近年以來，借籌餉為名，橫征暴斂，於防區紳民之擁有資財者，概用綁票手段，勒索鉅款……又其防區各縣所收正雜稅款，統計本年已留用百萬有餘……並且派員協商，分電院部撥款，俾資維持。惟軍隊既糜國家餉糈，而對於地方人民，不加保護，有匪不剿，已屬罪不容誅……當此國難日趨嚴重，設不幸激成巨變，惹起外交，牽一髮而動全身，復榘何能負此重大責任也。³⁴

整理韓說，概有三點：一為劉珍年與土匪聯合，橫徵暴斂，剝削人民；二為劉留用防區稅款，還向中央要求撥款；三為擔心劉部作為激起民變，造成外交波折。同日，劉珍年以巧電回復韓復榘，情詞恭順，強調「值此國難嚴重之際，正吾袍澤團結禦侮之時，安能其豈相煎，徒苦民眾？」³⁵ 見雙方電文，蔣中正並未率然支持一方，而是下令查明真相，³⁶ 軍委會並於次日（19 日）發電韓、

密檔與蔣介石真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頁 280-302。

³³ 呂芳上，〈抗戰前的中央與地方——以蔣介石先生與廣東陳濟棠關係為例（1929-1936）〉，《近代中國》，第 114 期（2001，臺北），頁 170-198；陳紅民，〈胡漢民·西南政權與廣東實力派〉，《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37 卷第 1 期（2007，杭州），頁 19-27；楊天石，〈胡漢民的軍事倒蔣密謀及胡蔣和解——讀美國哈佛燕京學社所藏胡漢民檔案〉，《蔣氏密檔與蔣介石真相》，頁 303-349。

³⁴ 國聞週報社輯，《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第 9 卷第 38 期（不詳），頁 7-8。此電於 19 日見報，參見《大公報》，天津，1932 年 9 月 19 日，版 4。

³⁵ 「鈞座派遣重兵進抵膠濟已令前方部隊向後撤退」（1932 年 9 月 22 日），〈山東韓復榘劉珍年二部戰爭案（一）〉，國防（軍事）—戰役—軍閥戰爭，《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72420003。

³⁶ 「蔣伯誠電蔣中正據日息韓復榘劉珍年兩部在濰縣衝突及蔣中正回電希速調查真相」（1932 年 9 月 18 日），〈民國二十五年（七）〉，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

劉，謂「迄未據貴部報告，究竟前項消息是否確實，以及詳情為何，盼即電復」。³⁷ 同日，劉珍年電蔣當前狀況，謂已將部隊撤退以示遜讓，請蔣指示機宜。³⁸ 蔣即復電謂：「請兄忍耐將事，中已派員徹查，非至最後一步，總以力避戰禍為要。務希縮短防綫，以待中央處理解決。請兄詳告處置辦法。」³⁹ 此時蔣對事變之處理，頗為審慎，雖已傾向劉珍年，⁴⁰ 但仍不妄下決定，甚至要求代理行政院長的宋子文「政府對魯事可暫緩表示」。⁴¹ 然蔣亦暗中布置，第一，致電在濟南的委員長代表兼軍事聯絡人蔣伯誠，請其徵詢掌握華北軍政大權的張學良意見，並請儘速回覆。⁴² 其次，派員調查濟南、臨城、德州、泰安、兗州與膠濟路全部，以及濰縣各處之駐軍番號與兵力，復令中華民族復興社特務處處長戴笠與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主任徐恩曾詳報德州至臨城一帶的布置情形，並要求「全力活動」。⁴³ 第三，蔣為防萬一，電第九師師長蔣鼎文云：

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269056。

³⁷ 「本會致韓復榘劉珍年皓午電」（1932年9月19日），〈山東韓復榘劉珍年二部戰爭案（一）〉，國防（軍事）—戰役—軍閥戰爭，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72420003。

³⁸ 國聞週報社輯，《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第9卷第38期，頁8。

³⁹ 「蔣中正電劉珍年忍耐將事力避戰禍縮短防線以待中央處」（1932年9月19日），〈統一時期（七十一）〉，籌筆—統一時期，《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200071039。

⁴⁰ 蔣於事發後謂「韓復榘之橫暴」，足見對韓之不滿，亦可觀其傾向。參見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16》，1932年9月19日記事，頁498。然劉部並非蔣之嫡系，蔣、劉關係若即若離，劉也對蔣有所戒備，因之蔣並未全力支持劉珍年。參見李仙洲，〈劉珍年的起家與失敗〉，收入山東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10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162；魯濤，〈劉珍年在煙台〉，收入山東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17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67-171。

⁴¹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16》，1932年9月19日記事，頁495-496。

⁴²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16》，1932年9月19日記事，頁495。21日，蔣再度去電蔣伯誠詢問張意見。參見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16》，1932年9月21日記事，頁511。

⁴³ 「蔣中正電林蔚速囑邱煒限期詳報津浦膠濟路沿線駐軍番號兵力」（1932年9月19日），〈統一時期（七十一）〉，籌筆—統一時期，《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200071037；「蔣中正電李延年速派員赴津浦膠濟沿線詳查駐軍番號與兵力」（1932年9月19日），〈統一時期（七十一）〉，籌筆—統一時期，《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200071038；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16》，1932年9月19日記事，頁496-497。

「韓、劉已開戰，時局嚴重，第九師應即集中，對德州以南平浦路各要站，須多派員查察兵，並準備以備萬一」。⁴⁴ 最後，蔣透過與劉珍年有同學關係的第十八軍軍長陳誠（同為保定軍校第八期）詢問劉部狀況，並申言中央立場，電陳謂：「須由弟用無線電密問劉席儒其決心如何，與能支持幾時。務屬其忍耐將事至最後陣綫，總以退讓為是。此為大局攸關，且劉係中央正式軍隊，為中央威聲計，自不能不干預，請以此意告劉」。⁴⁵

二、軟硬兼施的處置手法

9月20日，韓復榘復電軍委會，報告其出兵原因是「劉珍年割據地方，破壞行政，橫徵暴斂，肆無行無忌，民眾不堪壓迫」，⁴⁶ 與18日昭告各方之通電一致。同日，蔣對膠東之戰做出初步處置辦法，電汪兆銘謂：

魯事韓、劉突起變端，雙方同屬正式部隊，而中央事前毫無所聞，究應如何處理，吾兄意見何若？中意擬先派大員赴魯查辦，令雙方部隊各在現地停止再進，以免擴大事變，影響國際觀聽，此着是否可行？或者吾兄認為尚有其他更好、更妥辦法，統請賜電復示為荷。⁴⁷

當時蔣、汪關係不合，蔣甚至記述汪「詐偽」，⁴⁸ 但政治影響力終究不容輕忽，乃禮貌性向其報告處置方式，並詢問是否有所建議。同日，行政院開會，由軍政部部长何應欽報告山東軍隊衝突情形，決議嚴令制止韓、劉軍事行動，靜候中央處理。⁴⁹

⁴⁴ 「蔣中正電蔣鼎文以韓劉已開戰第九師應即集中以備萬一」(1932年9月19日)，〈統一時期（七十一）〉，籌筆—統一時期，《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200071036。

⁴⁵ 李扶漢，〈北洋軍閥膠東王劉珍年〉，頁325；「蔣中正電陳誠以韓復榘已進攻劉珍年請劉忍耐將事中央自不能不干預」(1932年9月19日)，〈統一時期（七十一）〉，籌筆—統一時期，《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200071033。電文將劉珍年（字儒席）誤作「席儒」。

⁴⁶ 「韓復榘號申參復電」(1932年9月20日)，〈山東韓復榘劉珍年二部戰爭案（一）〉，國防（軍事）—戰役—軍閥戰爭，《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72420003。

⁴⁷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16》，1932年9月20日記事，頁499。

⁴⁸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16》，1932年9月19日記事，頁498。

⁴⁹ 國聞週報社輯，《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第9卷第38期，頁8-9。

21 日，蔣中正電韓復榘謂：

按此次對劉事件，如兄於事前商呈中央處置，本不難謀解決途徑，不意兄竟突然動作，不特於對國內，對國際均足頓生不良之影響，尤其當此強暴憑陵之際，山東居華北咽喉之重，萬一因此釀成巨變危險，何堪設想？中央正在設法解紛，務望吾兄懸崖勒馬，制止軍隊再進，以免事態擴大，而留中央妥善處置之餘地。否則兄固以保國救民為懷，恐戰端一開，結果外為敵人所乘，亦為國際輕蔑，而宗邦受害矣；內則鋒鏑蹂躪，民亦被殃。賢達如兄，當非初願所及料也。除嚴電劉珍年退讓，毋得妄動外，謹掬心誠，幸請三思。近日情況，仍盼隨時電告為荷。⁵⁰

韓復榘出兵對外公布理由之一在避免劉珍年激起民變，引致外交波瀾，觀蔣此電，其反而認定韓出兵之舉動會造成國際不良影響。對於韓復榘之欲弔民伐罪，即便當時的確有許多民間人士上電表示支持，⁵¹ 蔣還是認定此舉「鋒鏑蹂躪，民亦被殃」。可見蔣對膠東戰事之是非對錯已定，但姿態仍放得十分低，以相當緩和的口吻勸告韓停止軍事行動，等待中央處置。蔣私底下對韓十分緩和，實為兩面手法之一面。同日，蔣電軍事委員會云：

山東韓、劉事件，亟應設法制止，擬用軍委會名義，呈請國府特派朱培德、沈鴻烈為查辦大員，並由國府特下明令，說明此種衝突應靜候中央解決，嚴令雙方各在現地停止再進，力避接觸，以免形勢擴大，並於令中曉示此種變端為對內、對外計，均萬不可開，宜痛切申言之。事機已迫，務祈迅速辦理，並即電復為荷。⁵²

蔣在此要求軍委會「『嚴令』雙方各在現地停止再進」，可見蔣一強一弱，又勸告又壓迫之處置方式，可謂「軟硬兼施」。軍委會乃電韓告以國聯大會即將開幕，此時為民族存亡之機，勿令日人以地方之問題為口實，要求所部停止軍事

⁵⁰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 16》，1932 年 9 月 21 日記事，頁 503-504。

⁵¹ 如「周宗執等電蔣中正願率歷城縣聯莊會員荷戈執挺追隨韓復榘共殲劉珍年」（1932 年 9 月 20 日），〈民國二十一年（四）〉，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56031；「李樹春何思源等電蔣中正迅頒明令褫奪劉珍年本兼各職並飭嚴拏究辦」（1932 年 9 月 20 日），〈民國二十一年（四）〉，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56080。

⁵²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 16》，1932 年 9 月 21 日記事，頁 509。

行動，靜候中央處理。⁵³ 21 日，劉珍年覆電蔣謂：

慨自暴日侵凌，國難日亟，赤匪蔓延，民族佔危。凡屬黃帝裔胄，諒無不團結精誠，共赴國家之難。豈能箕豈相煎，反促淪亡之禍？……禍變猝來。韓復榘竟乘國難嚴重之期，暗遣重兵進襲本師。敝部與韓軍素無芥蒂，竟爾無故稱兵，吾不知韓某是何居心！珍年為國家民眾計，為服從蔣委員長及何部長電令計，故將前方部隊毅然後退，以明遜讓。……不意我退彼進，相逼益急，但恐最後部屬奮激，以至忍無可忍之時，出而為自衛之計。則塗炭民眾，甘為戎首之責任，珍年決不能負其絲毫。此種萬不可得已之苦衷，尚垂全國父老兄弟鑒而諒之，不勝欣幸之至。披瀝陳詞，諸維亮察。⁵⁴

劉珍年向蔣訴情，顯示戰爭責任在韓復榘。此電似引致蔣對韓強硬之心，22 日，蔣電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謂：「魯事似以澈底查辦為宜，以戒悍將驕橫，稍樹中央威聲，未知公意何如，並乞詳示」。⁵⁵ 但蔣隨即反悔，在軍事委員會第二、三廳廳長何應欽（兼軍政部長）、朱培德建議下，決定如韓能停止軍事行動，則可不必發布查辦明令。於是蔣電文官長魏懷轉林森，請其緩發魯事查辦命令。⁵⁶ 觀察以上過程，吾人可知蔣此時處置軟硬兼施，不僅為其策略表現，實亦為其對韓處置心態未定之故。

⁵³ 全文謂：「機急沙河韓總指揮勛鑒：號申參電誦悉。密。執事應魯東人民之請求，忍痛興師，仁者用心，自可原諒。惟目前國聯大會行將開幕，并已欣然接受我國抗議，各友邦對我亦均表示好感。民族存亡之機，將於此時決其命運。而日人則屬以缺乏組織、內亂頻仍之國家目我，恣意宣傳，百端離間，必欲使我無法立足於國際間而後快心。今若因地方至極微細之問題而資口實，於強鄰失信用，於國聯使日人狡謀因而得逞，諒亦必非愛國者之初心。執事盱衡全局，公忠為國，緩急輕重之間，似宜稍加審慎。務望接電立飭所部停止軍事行動，靜候中央處理，國家前途實利賴之。近情為何，仍盼隨時具告。軍事委員會禡西公印」，「本會覆韓復榘禡西公電」（1932 年 9 月 22 日），〈山東韓復榘劉珍年二部戰爭案（一）〉，國防（軍事）—戰役—軍閥戰爭，《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72420003。

⁵⁴ 「部隊後退至無可忍之時自衛戎首之責珍年決不能復」（1932 年 9 月 23 日），〈山東韓復榘劉珍年二部戰爭案（一）〉，國防（軍事）—戰役—軍閥戰爭，《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72420003。「佔」危為「阨」危之誤，原文如此，暫不改動。

⁵⁵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 16》，1932 年 9 月 22 日記事，頁 512-513。

⁵⁶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 16》，1932 年 9 月 22 日記事，頁 519-520。

蔣除藉中央機構（軍委會）對韓施加壓力以外，亦施展輿論壓迫的辦法，電上海市市長吳鐵城謂「希兄在滬運用中外報章輿論一致壓迫，以促其覺悟爲要」，⁵⁷ 又電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陳立夫云「望兄在京滬運用內外輿論力量加以壓迫，促其覺悟爲要」。⁵⁸ 輿論壓迫在之後蔣致韓電文可以不斷看到，爲蔣對膠東之戰的主要處置手段之一。事實上，在蔣未操作輿論的狀況下，要求和平之呼聲便甚高昂，如廢戰大同盟、張學良、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學忠、第十五路軍總指揮馬鴻逵、青島特別市市長沈鴻烈、陳濟棠等西南各將領皆呼籲和平，⁵⁹ 報紙亦要求停止內戰。⁶⁰ 蔣之輿論壓迫，並非獨具，然或有推波助瀾之效。⁶¹

9月24日，何應欽電蔣膠東戰事處置辦法，建議將劉珍年部調贛東或撫州，如此不但解決魯東糾紛，亦可增厚贛省剿匪兵力。⁶² 蔣覆電謂：

調劉珍年部隊離魯，中本有此意，但劉此時是否願意他調，尚不可知。且調至江西，劉必更不從命，如今出不行，則中央不惟失聲威

⁵⁷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16》，1932年9月21日記事，頁511。

⁵⁸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16》，1932年9月21日記事，頁511-512。

⁵⁹ 《益世報》，天津，1932年9月21日，版2；《大公報》，天津，1932年9月21日，版4；《大公報》，天津，1932年9月22日，版4；《大公報》，天津，1932年9月24日，版4；《申報》，上海，1932年9月20日，版3；《申報》，上海，1932年9月24日，版2。

⁶⁰ 如《益世報》，天津，1932年9月18日，版3，對此戰爆發之標題謂：「時至今日！國人何忍再見內戰……速回頭！毋令國人痛敵人快。」如《益世報》，天津，1932年9月19日，版2，社論標題謂：「應設法制裁韓劉的戰事。」如《益世報》，天津，1932年9月24日，版2有標題謂：「魯戰引起世界惡評：英報指陳為日本造機會，日方宣傳中國非統一國。」又如《申報》，上海，1932年9月24日，版2刊有「韓劉內戰將如何制止」之時評。

⁶¹ 查考國民黨較可掌控的《中央日報》，在膠東戰事爆發之初，報導明顯較其他各大報要少。在蔣指示運用輿論之後，相關報導、社論大量出現，皆有以輿論壓迫內戰之意，此或可視為蔣指示之實現。參見《中央日報》，南京，1932年9月23日，第1張第2版；《中央日報》，南京，1932年9月24日，第1張第3版、第2張第3版；《中央日報》，南京，1932年10月13日，第2張第3版；《中央日報》，南京，1932年10月18日，第1張第2版；《中央日報》，南京，1932年10月22日，第1張第3版。

⁶² 「何應欽電蔣中正擬將劉珍年部調贛東或撫州或可無形解決魯東糾紛增厚贛省剿匪兵力」（1932年9月24日），〈民國二十一年（四）〉，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56142。

於天下，而且失信用於部下，故此事只可以後照此方針設法進行，而不能於此時貿然下令，更不可因韓向方有要求之形式出之。目前第一步應先令其將各部調回原防，恢復原狀，然後再可協商其他辦法，否則如此時中央下令調劉離魯，則威信一失，必使以後一切處置更不易矣。⁶³

可知蔣此時已決定將劉調開，但時機未到，於是力主雙方軍事先恢復原狀（第一步），再候待協商其他辦法。而若「韓復榘一意進行，不服制止」，則「從嚴制止，不必顧慮也」，⁶⁴ 復可見蔣強硬的一面。

三、退讓方針之確定

9月23日晚間，在各界呼籲和平及蔣中正軟硬兼施的處置手法之下，韓復榘停止軍事行動，⁶⁵ 並通電聽候中央查明處理，⁶⁶ 情勢似已有轉圜。25日，蔣電朱培德、何應欽、蔣伯誠云：

向方兄停止軍事行動，顧全大局，無任欣慰，至劉師長他調，中早有此意，且前已面詢向兄，向兄並無表示，而此事突變，則未先告於中，竟致如此，殊為遺憾。今軍事停止，第一步應撤退兩方部隊，調回原防，恢復原狀。請中央就近派員赴掖縣，嚴令劉師長靜候中央處理，對第三路撤防時，不得前進衝突，另派公正同志如張葦村兄等，前往監察，然後再定第二步之處理。切望向兄一聽中央之命，不可有要求或任何條件之形式，更不可以表示辭意，免被幾近要脅之譏也。⁶⁷

⁶³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16》，1932年9月24日記事，頁528-529。

⁶⁴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16》，1932年9月24日記事，頁535。

⁶⁵ 「俞飛鵬電蔣中正報告韓復榘已通電停戰駐煙台劉珍年二十一師撤退肇和艦派隊登岸維持治安」（1932年9月24日），〈民國二十一年（四）〉，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56148；「邱燦電蔣中正據報韓復榘劉珍年兩軍確於二十三晚停戰」（1932年9月27日），〈民國二十一年（五）〉，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57058。

⁶⁶ 《大公報》，天津，1932年9月25日，版4；《申報》，上海，1932年9月25日，版3。

⁶⁷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16》，1932年9月25日記事，頁536-537。

蔣再次強調他的「第一步」處置方式，即調回原防，恢復原狀，中央威信不可失，不接受任何要脅。但韓復榘停戰後，並不完全撤退軍隊，電蔣謂：

劉珍年盤據煙台，暴斂橫徵，事實俱在，有目共睹……此次復榘應膠東人民之請命，兼為國家弭此亂原，倉促之間，實出萬不得已。唯事前未曾報告……復榘自矢心粗氣躁，處事慌張，應請鈞座予以相當處分，以示懲儆……職自奉令停止軍事活動，當即嚴令前方遵照，僅留相當兵力，即當地民眾亦自相結合，共在城外布圍，其餘部隊漸次回防。⁶⁸

韓電以事發未向蔣報告，表示歉意，自請處分。軍事行動雖已停止，並部分撤防，但仍布兵圍城。蔣乃擬具發予蔣伯誠之電文（27日），請何應欽、朱培德斟酌轉發：

如此辦法並未照第一步處置，何得謂之遵命？如為山東與向兄計，皆以此事速了為上策，更勿可使中央為難，否則中央既不忍所部其豆相煎，又何忍欺詐所部，自失信義？假使向兄立於中央地位，而設身處地着想，則照向兄現在要求與處置，中央能否下令？其令能否有效？且時日延長，徒苦人民與國家部隊，於公於私，究有何益？吾人既不忍強人所不能為之事，而況於中央乎？中正忍痛國難，自愧無狀，何忍再言其他？魯事任由向兄解決可也！⁶⁹

蔣再度表現其軟的一面，欲韓站在中央立場思考，動之以情，文末甚言「魯事任由向兄解決可也！」然調停無效，韓、劉兩部仍一進一守。⁷⁰ 約此同時，韓派山東省政府委員張鉞謁蔣，⁷¹ 蔣再度展現和緩、退讓的一面，對張說：「如向方欲中央下令，則必須照第一步辦法，然後再可令調劉部，方不使中央失信於部下，否則如向方必欲用武力完全解決劉部，則中央只有不問魯事，讓向方

⁶⁸ 國聞週報社輯，《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第9卷第39期，頁8，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3編第7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頁4088。

⁶⁹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16》，1932年9月27日記事，頁549-550。

⁷⁰ 「俞飛鵬電蔣中正韓復榘劉珍年兩部仍一進一守魯膠東戰事可能拖長等軍情」（1932年9月28日），〈民國二十一年（五）〉，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57087。

⁷¹ 「張鉞在28日晨十時，飛滬轉牯嶺謁蔣」，《大公報》，天津，1932年9月29日，版4。

全權處理可也。」⁷² 可見蔣此時處置方針已由軟中帶硬、軟硬兼施轉以退讓為主。於是多次電劉珍年安慰，⁷³ 請其「忍耐，勿趨燥急」，⁷⁴ 甚而電何應欽謂「魯事請兄與益之兄〔朱培德〕妥商辦法處置可也」，⁷⁵ 乃至於決定「姑待韓以後動作，能否尊重中央命令，再定辦法」。⁷⁶

戰事到 10 月初，演為雙方互控之階段，雙方零星衝突未已。⁷⁷ 5 日，韓復榘電蔣中正報告劉珍年殘殺人民；⁷⁸ 劉則電蔣韓復榘到處擾亂並擴大軍事行動。⁷⁹ 見戰事膠著，調停無成效，蔣於 7 日再電韓，略謂國難嚴重，不宜久成相持之局，並強調不可損及中央之威信。⁸⁰ 同日，蔣又電韓及劉，甚可表現其當時調停之考量重點：

頃聞滬報載電通社五日東京電，日本陸軍省對現今中國之混亂狀態，其當局發表如下之談話，反駁李頓報告書所言中國在發展之過渡期，謂山東省有韓劉之衝突，福建省則有省主席問題，十九路軍

⁷²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 16》，1932 年 9 月 30 日記事，頁 562-563。

⁷³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17—民國 21 年 10 月至 12 月》（臺北：國史館，2005 年），1932 年 10 月 3 日記事，頁 22。

⁷⁴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 16》，1932 年 9 月 30 日記事，頁 563。

⁷⁵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 17》，1932 年 10 月 3 日記事，頁 22。

⁷⁶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 17》，1932 年 10 月 4 日記事，頁 28。

⁷⁷ 衝突情形，可見各報報導，舉要如《申報》，上海，1932 年 10 月 3 日，版 9；《大公報》，天津，1932 年 10 月 4 日，版 4；《大公報》，天津，1932 年 10 月 5 日，版 4；《申報》，上海，1932 年 10 月 5 日，版 3；《申報》，上海，1932 年 10 月 6 日，版 3。

⁷⁸ 「韓復榘電蔣中正報告劉珍年軍在萊陽城殘殺人民及掖縣方面軍情」（1932 年 10 月 5 日），〈民國二十一年（六）〉，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58053。

⁷⁹ 「劉珍年電蔣中正請聲討韓復榘到處擾亂擴大軍事行動」（1932 年 10 月 5 日），〈民國二十一年（六）〉，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58039。

⁸⁰ 電文謂：「膠東糾紛未了，慚惶萬分，兄之心跡中實深諒，惟國難嚴重，不宜久成相持之局。日前電囑伯誠、葦村諸兄盡力疏解，原冀苦心共喻，速謀解決，以免事態擴大，乃收效未宏。今中央再行派員實地徹查，自亦未常不可，弟必須當事者確有接受命令之誠意，而願切實奉行之方可有濟，否則不惟徒增當地之困難，或且涉及中央之威信。兄為中央與國家地位計，設身處地當能計慮及之。解決本案究應如何，尚希詳加考慮電覆是荷。」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 17》，1932 年 10 月 7 日記事，頁 46-47。

現方與當地軍隊爭奪中，又共產軍亦逞威跳樑，青海之南部及西康被藏軍佔領，四川全省亦在混亂之中，致南京政府極感困云云。又查上海大美晚報近載一評論，略謂韓、劉之爭城奪地，應受日本政府最高之獎章，因日本藉此可昭示國際，謂中國事實上並未統一，且可加強日本進取華北之決心等語。溯自膠東問題發生以來，輿論沸騰，以為際此國難嚴重之時，竟有同室操戈之變，痛心疾首，奔走呼號，冀能共勒懸崖之馬，力挽既倒之瀾，絕續存亡間不容髮。今強寇既以此聳動國際之視聽，外報復大肆惡劣之宣傳，倘烈燃箕之禍，必遺噬臍之憂。兄等久歷行間，飽經憂患，尚希養蓄部屬，以為國家干城之寄，保元氣以振民族復興之機也！言盡於此，幸各勉之。⁸¹

蔣提及日本以中國各地成分裂態勢，反駁國聯調查九一八事變後做出之報告，建構九一八事變後日方接收東北、進取華北之合法性，其中山東韓、劉衝突便成為日本申言之利器。蔣指出，如此同室操戈，反倒幫助日本，國內因此輿論沸騰；欲藉此對韓、劉施加壓力。電文謂「輿論沸騰」，部分為蔣在事發後所製造，欲予韓輿論壓迫（詳前），而提及「烈燃箕之禍，必遺噬臍之憂」，則和劉珍年事發後呈蔣之電文相呼應。⁸² 可見本文電雖同時致送韓、劉，對韓之指責明顯大於劉。

蔣欲以外交產生之輿論壓力影響韓，事實上自己也難不受此限制，戴笠呈蔣的情報謂：

1. 青島自沈鴻烈將海軍陸戰隊及軍艦四艘調往煙台、龍口一帶，脅迫劉軍後，市面突行緊張。……
2. 日人在青乘機造謠，謂此次總座

⁸¹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 17》，1932 年 10 月 7 日記事，頁 47-50。

⁸² 9 月 18 日劉珍年回覆韓復榘之電文謂：「值此國難嚴重之際，正吾袍澤團結禦侮之時，安能箕莛相煎，徒苦民眾？」「鈞座派遣重兵進抵膠濰已令前方部隊向後撤退」（1932 年 9 月 22 日），〈山東韓復榘劉珍年二部戰爭案（一）〉，國防（軍事）—戰役—軍閥戰爭，《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72420003。此電首次使用箕莛相煎之譬喻，該電其後轉呈中央，之後劉呈中央之電文，亦多次使用。此時蔣亦以此譬喻，可推知蔣支持劉之觀點，與其有所呼應。本文多處引文用字不同，其豆、箕莛、其莛皆存，今依原文而不改動。

暗中接濟劉軍大批械彈，並嗾使劉軍與韓作戰。⁸³

即日人造謠蔣中正在膠東之戰支援劉珍年與韓對抗，欲呈現中央亦加入混戰之局面。配合上述蔣同時致韓、劉之電文（7 日），可推知蔣何以由軟硬兼施轉為採取退讓之處理方針，對戰事訴諸調停、輿論；蓋其不欲過度介入膠東戰事，使事變升級，坐實日人宣傳，並違反全國一致對外之輿情。⁸⁴ 於是蔣乃電朱培德、何應欽謂魯事處置可暫緩，⁸⁵ 即欲靜觀輿論是否足以影響韓服從中央調處。

肆、處置的兩難：武力解決抑或竭力忍受

一、從戰事膠著至熱戰

膠東之戰爆發半個月以來，仍無法解決，韓、劉軍事陷入膠著，適國聯報告書出爐，⁸⁶ 掀起國際巨潮，⁸⁷ 山東局勢動見觀瞻，蔣除派中央大員調解與訴諸輿論壓力外，並無其他實際作為。10 月 7 日，第三十二軍軍長商震電蔣韓

⁸³ 「戴笠電蔣中正自沈鴻烈部艦隊調往煙台脅迫劉珍年軍局勢突行緊張日人乘機在青島造謠」（1932 年 9 月 27 日），〈民國二十一年（五）〉，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57057。

⁸⁴ 當時駐日外交官蔣作賓日記所言，頗可呈現輿情，其 9 月 18 日日記謂：「閱報知劉珍年、韓復榘又起衝突。國事至此，軍閥尚不知亡國之恨，猶為閭牆之爭，可為痛哭也。」10 月 5 日日記謂：「國難如此緊急，國內仍紛起自鬥，幾不知人間有羞恥事。……〔如〕山東之韓復榘、劉珍年……皆只知眼前一己利害，國仇皆不顧也。」參見蔣作賓，《蔣作賓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 年），頁 474、479。

⁸⁵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 17》，1932 年 10 月 7 日記事，頁 52。

⁸⁶ 國際聯盟調查團報告書於 10 月 2 日在日內瓦、南京、東京三處同時發表。參見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2（臺北：出版者不詳，1978 年），頁 225-235。各報皆以顯著標題進行摘要報導。《申報》，上海，1932 年 10 月 2 日，版 3；《申報》，上海，1932 年 10 月 3 日，版 3、4、6、7、8；《大公報》，天津，1932 年 10 月 3 日，版 3、4；《益世報》，天津，1932 年 10 月 3 日，版 1、2；《中央日報》，南京，1932 年 9 月 23 日，第 1 張第 2 版；《中央日報》，南京，1932 年 10 月 3 日，第 2 張第 2、3、4 版。

⁸⁷ 《申報》，上海，1932 年 10 月 4 日，版 6、7；《益世報》，天津，1932 年 10 月 4 日，版 1；《益世報》，天津，1932 年 10 月 5 日，版 2；《大公報》，天津，1932 年 10 月 5 日，版 3。

軍兵力不甚整齊，難以澈底解決劉部，且韓懾於各方輿論，對劉又無適當辦法，已處進退維谷之境，⁸⁸ 蔣於是認為韓「近力盡，似有悔禍之意」，⁸⁹ 開始有將韓、劉同時調開之議。⁹⁰

蔣對魯事訴諸輿論同時，亦關心馮玉祥之動向。馮玉祥為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北伐後與蔣進行大規模內戰，此時下野蟄居泰山，⁹¹ 韓復榘為其舊部，蔣似對馮、韓聯繫不甚放心。10月7日，馮由泰安北上宣化，蔣不知其用意為何，請蔣伯誠查詢回報。⁹² 但蔣並不認為馮與膠東之戰有所關聯，⁹³ 推論「人多疑彼另有作用，余細思之，乃因韓復榘與劉珍年作戰不利，韓欲求好于中央，故促馮離魯也。然馮本人之用心則欲往宣化、張家口邊區肆意搗亂，而其結果則反有利於中央也。」⁹⁴ 除可見蔣對馮留心而不憂心，亦可知其對於韓服從中央有一定信心。蔣之猜測沒有錯誤，馮玉祥在9月30日之日記中謂：「韓之盲動，真是可憐」，10月1日謂：「韓復榘之事，劉珍年可謂毫無深謀，多由衝動、盲動而來，名義不正大，外交無連絡，說打便打，如何不陷於絕境？」⁹⁵ 故知馮對韓「盲動」挑起戰端並不支持，此時離魯是為前往張家口組織舊部抗日。⁹⁶

蔣以為韓將服從中央調停，事後看來多屬幻想。10月10日，韓復榘猛攻劉軍，⁹⁷ 同時電蔣劉軍擾亂地方，⁹⁸ 並發表告膠東父老書，沉痛表示「劉暴

⁸⁸ 「商震電蔣中正韓復榘派員到順德晤談情形其意似藉窺豫冀駐軍動靜」（1932年10月7日），〈民國二十一年（六）〉，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58139。

⁸⁹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17》，1932年10月8日記事，頁68。

⁹⁰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17》，1932年10月9日記事，頁73-74。

⁹¹ 王贊亭，〈馮玉祥兩次隱居泰山見聞片段〉，頁88-89。

⁹²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17》，1932年10月8日記事，頁61-62。

⁹³ 蔣電劉珍年云：「所謂韓此次興戎，有馮與粵方為之背景，是未必然。」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17》，1932年10月3日記事，頁22。

⁹⁴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17》，1932年10月8日記事，頁69-70。

⁹⁵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3冊，1932年9月30日、10月1日記事，頁700。

⁹⁶ 王華岑，〈跟隨馮玉祥在泰山〉，收入山東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14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62。

⁹⁷ 「陳立夫電蔣中正韓復榘猛攻劉珍年部情形」（1932年10月10日），〈民國二十一年（六）〉，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58183。

⁹⁸ 「韓復榘電蔣中正轉報劉軍騷擾地方各情」（1932年10月11日），〈民國二十一年（七）〉，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59012。

行愈多，我罪過愈大」，於是「下除劉萬分決心，不半途中止」。⁹⁹ 山東各地機關、團體亦電蔣聲援韓。¹⁰⁰ 此時蔣雖知韓、劉雙方所提和解方案相距甚遠，但仍堅持先停戰撤兵之「第一步」辦法。¹⁰¹ 中央要求停戰撤兵之方案，對於已併吞大量劉珍年統治區域之韓復榘相當不利，韓當然難以接受，¹⁰² 且韓與日方有所接觸，曾要求日人提供援助，¹⁰³ 冀望輿論影響韓一致對外，直如緣木求魚，中央調停無功已可預見。

10 月 11 日，中央視察員李鉞、范毓璜抵達前線，戰事稍歇。¹⁰⁴ 10 月 15 日，劉珍年電蔣韓復榘趁中央視察員離開後，於 13 日晚間猛攻掖城。¹⁰⁵ 16 日，蔣乃謂：「韓復榘一方聲明服從中央，一方運大砲積極攻掖，此種行動卑劣無恥極矣，不知此種遺毒何日能清耶？」¹⁰⁶ 電軍政人員查復。¹⁰⁷ 17 日，蔣得到更多韓軍大規模攻擊劉軍之資訊，顯見韓對中央處置辦法澈底揚棄，乃電何應欽謂：

向方果如此深明大義，則中央本極易處理。詎聞銑日滬報載電通社刪日青島電，畧謂韓對中央調停條件嚴詞拒絕，李、范認為無再協

⁹⁹ 《大公報》，天津，1932 年 10 月 12 日，版 4。

¹⁰⁰ 如「牟平各界聯合會電蔣中正反對劉珍年部駐防牟平」（1932 年 10 月 11 日），〈民國二十一年（七）〉，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59004；「登萊各縣代表李濰海等電陳劉珍年之罪惡」（1932 年 10 月 11 日），〈民國二十一年（七）〉，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59025；「山東新泰縣政府等電蔣中正等請明令討伐劉珍年」（1932 年 10 月 11 日），〈民國二十一年（七）〉，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59026；「德縣各機關等電蔣中正請討伐劉珍年」（1932 年 10 月 13 日），〈民國二十一年（七）〉，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59059。

¹⁰¹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 17》，1932 年 10 月 14 日記事，頁 145。

¹⁰² 呂偉俊，《韓復榘》，頁 97-98。

¹⁰³ 臧運祜，《七七事變前的日本對華政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年），頁 37。

¹⁰⁴ 《大公報》，天津，1932 年 10 月 13 日，版 4。

¹⁰⁵ 「劉珍年電蔣中正自中央視察員離掖城後韓軍又於十三日晚猛攻又據報馮玉祥加入西南韓復榘至相當時期仍聽馮指揮」（1932 年 10 月 15 日），〈民國二十一年（七）〉，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59094。

¹⁰⁶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 17》，1932 年 10 月 16 日記事，頁 149-150。

¹⁰⁷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 17》，1932 年 10 月 16 日記事，頁 153-154。

議必要，已回南京。一面韓軍憤中央處置不公，違反停戰令，除由濟南急運大砲、彈藥及食糧赴前綫外，並對各部先發薪餉一月以鼓舞士氣，決澈底解決掖縣城內劉軍，已開始積極軍事行動云。又該社同日掖縣電，韓軍於昨晚七時向全線下總攻擊令，在濰縣待命中之砲兵團陸續出發，載滿彈藥之馬車馳赴戰綫，對劉珍年死守掖縣、萊陽、棲霞等處已開始攻擊。又路透社同日北平電，今日接外電稱韓軍已接管煙台各等語，似此情形向方正在積極猛攻，其對中央所言根本已成疑問。兄可以上列各情電質向方究竟有無接受中央處置辦法之誠意，囑其迅復為要。¹⁰⁸

從蔣所得資訊看來，韓已不顧中央號令，積極布置，欲澈底解決劉軍。蔣對此情形甚感焦急，要求何應欽質問韓復榘並迅速回覆。次日，蔣對原先堅持之「第一步」辦法已開始鬆動，電陳誠謂：

頃接伯誠電稱，擬請調令韓部撤退至濰河以西，令劉部暫駐某某縣，其中間之某處某縣暫由地方團警維持治安，雙方靜候中央處理。又韓表示如此項第一步做到，則第二步處置願與劉同時調離山東等語。請以此詢儒席之意見如何。使韓亦果願調離山東，則儒席究願調至何處，亦一併預商，並可詢儒席意見，是否不必用第一步辦法，而直接用第二步辦法，如此或於劉更為安全也。¹⁰⁹

在此電文中，蔣請陳誠詢問劉珍年欲調何處，並提及韓復榘願一同調離。原先一直堅持雙方停戰撤退（即第一步）的蔣，亦以劉部安全為理由，建議劉直接撤離（第二步）。同日，蔣電何應欽謂：

魯事分第一步、第二步辦法下令處理，自屬妥當，但須先行徵求雙方同意方可下令，因恐劉未必信此第一步辦法便足保障其安全也。中意如能不用第一步辦法，即由中央一面下令調雙方部隊離魯，一面調憲兵往前方駐守中間地區，監視雙方撤兵，禁止衝突，則為最妥。否則僅調韓部至濰河以西，劉必不安心。以據劉言，所謂膠東團警實即韓部化裝，其言外之意已表明不能接受此項辦法。如向方願為國家與中央威信計，而能聽命他調，則可調任河南或湖北主席，

¹⁰⁸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 17》，1932 年 10 月 17 日記事，頁 159-160。

¹⁰⁹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 17》，1932 年 10 月 18 日記事，頁 163-164。

但此言現時尚恐說得太早。即不用第一步辦法，此時亦不必遽行直說，以免啟其疑慮。惟如能由向方自動提議，願調任他省，則更妥洽也。上列辦法，何如請與益之兄詳酌，蓋韓部倘不調離魯境，則今後國防之主要布置將無從措手，愈後愈難處理矣。¹¹⁰

閱蔣此電，復次見蔣放棄第一步處置辦法，希望韓、劉能一併離魯。言詞間可見蔣對調離韓沒有把握，但明確指出韓部離魯之重要性。19 日，韓復榘電蔣，藉口劉珍年部譁變後糜爛地方，故前方部隊並未撤退。¹¹¹ 蔣聞訊大怒，認為上述為韓之飾詞，此舉已與原定辦法完全相反，因此記曰：「向方不惟不遵命，而且食言，非懲罰不可也！」¹¹²

二、武力解決？

對於韓復榘大舉攻劉，10 月 23 日，陳誠提出建議，認為對韓除「武力解決」別無他法：

查韓此次對劉，其目的皆在根本解決之，以得海口，而遂其華北領袖之野心。現劉部據劉之參謀姜敦亨報稱，恐有不能久持之勢。韓之飾詞翻悔，亦即此也。惟劉被韓解決後而韓既遂得海口之願，並有日本為其背景，恐華北從此多故，實非黨國之福。職意對軍閥祇有根本解決之法，他無善法也。惟目前用兵所應考慮者：（一）日本以中國內亂或以中國政府無力平亂為藉口，何種影響國聯開會為大？（二）是否牽動華北問題及勒匪有無大碍？職以為如華北無問題，對勒匪無大碍，我中央能指揮相當兵力，仍以武力解決之為有利。當否仍乞鈞裁，職陳誠呈漾子印。¹¹³

¹¹⁰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 17》，1932 年 10 月 18 日記事，頁 164-166。

¹¹¹ 「韓復榘電張鈞因恐劉珍年部譁變後糜爛地方是以前方部隊未敢全撤」（1932 年 10 月 19 日），〈民國二十一年（八）〉，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60057；「韓復榘電蔣中正膠東人民自動驅逐劉珍年為免地方糜爛擬不撤退」（1932 年 10 月 20 日），〈民國二十一年（八）〉，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60049。

¹¹²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 17》，1932 年 10 月 20、22 日記事，頁 175、187-188。

¹¹³ 「陳誠電蔣中正陳述對韓復榘仍應以武力解決」（1932 年 10 月 23 日），〈民國二十一年（八）〉，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

陳誠認為，韓此次必欲澈底解決劉部以得海口，恐與日人勾結遂行其華北領袖之野心，故當以武力以為根本之解決。而陳亦分析武力對付可能導致的外交與內政問題，認為外交上中央動武，則國家更亂；不動武，日人也將以中央無力平亂為藉口。內政上，陳誠也考量到動武對華北、剿共之影響，以為若無大礙，以武力解決為有利。對於陳誠這個建議，蔣批示：「閱 不必覆」，¹¹⁴ 而於隔日命第三十二軍軍長商震準備入魯，但蔣並未迷信武力，自記曰：「對魯案以不用兵為上策，先調韓離魯，次則先以兵入魯南以觀其變，用兵為不得已事也。」¹¹⁵ 依上文論述，膠東之戰爆發以來，蔣之處置轉以退讓為主，而由此處態度復證，動武始終不是蔣的處置主軸。

武力解決非蔣處置重點可知，然而，據劉珍年的參謀長韓洞回憶，事發後其於9月27日抵廬山向蔣報告，情形為：「當時蔣極為震怒，並說，我在前幾天曾向韓復榘要兩團人，他竟未答應，想不到他是為襲擊劉軍，韓復榘太可恨了，我要消滅他。」¹¹⁶ 韓洞並稱10月5日韓、劉停戰後，蔣「密派商震為西路總指揮，由河南進窺魯西。徐庭瑤為南路總指揮，所部第四師已由蚌埠向徐州開進，于學忠為北路總指揮，由河北取路德州對韓布下包圍形勢。」¹¹⁷ 韓洞此說十分可疑，蓋蔣於事發後力主調停，要求雙方依第一步處置辦法停戰撤兵，且遍查史料，10月5日前後未見國軍有如韓洞所稱之調動。第三十二軍軍長商震部當時駐河北邢臺、邯鄲、大名等地區，¹¹⁸ 無法「由『河南』進窺魯西」；第四師師長徐庭瑤在金家寨剿共；¹¹⁹ 河北省政府主席（9月11日就任）、

002080200060143。

¹¹⁴ 「陳誠電蔣中正陳述對韓復榘仍應以武力解決」（1932年10月23日），〈民國二十一年（八）〉，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60143。

¹¹⁵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17》，1932年10月24日記事，頁205-206。

¹¹⁶ 韓洞，〈膠東之戰〉，頁140。

¹¹⁷ 韓洞，〈膠東之戰〉，頁140。

¹¹⁸ 新銘，《國軍軍史：軍級單位戰史》（臺北：知兵堂出版社，2007年），頁201。

¹¹⁹ 查考《蔣中正檔》，可見9月底至10月徐庭瑤呈蔣中正在金家寨剿共之戰況文電，如「徐庭瑤電蔣中正獲報簡家沖有紅四軍十二師及游擊師萬餘人等情職師待與第二縱隊取得連絡後即向金家寨進剿」（1932年9月19日），〈武裝叛國（二十七）〉，特交文電—共匪禍國，《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300050359；「徐庭瑤電蔣中正昨日派隊赴金家寨以西岳中肅清散匪在金寨西北扼五里許搜繳雜槍已呈繳軍政部點收金家寨設一倉庫預儲糧彈實為防匪切要」（1932年10月2日），〈武裝

東北軍將領于學忠則在防範共黨活動。¹²⁰ 令人好奇，不僅韓洞有蔣調派軍隊的回憶，曾任山東省政府參議的王一民亦謂蔣「令黃杰集中徐州，準備助劉攻韓。」¹²¹ 雖與韓洞說法略為不同，一稱徐庭瑤進向徐州，一說黃杰部集中徐州，但都直指蔣調動軍隊。西北軍將領張宣武則回憶：「（韓復榘）以武力攻打劉珍年，蔣、韓之間的矛盾公開化、白熱化了。蔣介石命劉峙集中五個師，陳兵徐州，擺出威脅山東的架勢」，倒指出是劉峙陳兵徐州。¹²² 呂偉俊整理以上回憶，謂蔣「氣沖沖地調集兩路大軍援劉攻韓，調劉峙部由徐州向北進攻；調商震部由河北向南進攻……南路軍黃杰部已進抵魯南郯城。」¹²³ 以上各色各樣說法，內容皆不一致，但蔣調兵攻韓則一。而進一步查考當時軍隊調動狀況，如第二師師長黃杰是時在湖北省東北部剿共，並無「進抵魯南郯城」情形，¹²⁴ 可知相關說法並不正確。我們或可從派兵內容並無定說推論，這些應為當時軍政人員對蔣動向之猜測。又，蔣在事發之初便令蔣鼎文的第九師集中以備萬一（詳前），後改令商震的第三十二軍集中準備，交代河南省政府主席劉峙與商

叛國（二十八）》，特交文電—共匪禍國，《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300051196；「徐庭瑤電蔣中正連日派隊赴金家寨西南王家祠及東北南水田山中肅清散匪搜獲匪械續獲步馬槍機槍等並派員呈繳軍政部點收」（1932 年 10 月 11 日），〈武裝叛國（二十九）〉，特交文電—共匪禍國，《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300052047。皆未見徐部有任何韓洞說的「徐庭瑤為南路總指揮，所部第四師已由蚌埠向徐州開進」之軍事活動。當時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之作戰序列，可參見曹劍浪，《中國國民黨軍簡史》，上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0 年第 2 版），頁 278-279。

¹²⁰ 「于學忠電蔣中正已遵屬嚴防共黨活動」（1932 年 12 月 8 日），〈民國二十一年（十三）〉，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65017。于學忠於 9 月 11 日就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參見「于學忠電中央國府各院部會遵於本日在天津就河北省政府委員兼主席職」（1932 年 9 月 11 日），〈領袖指示補編（一）〉，特交文電—領袖事功—領袖指示，《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106001069。

¹²¹ 王一民，〈韓復榘與南京中央鬥法述要〉，收入《一代梟雄韓復榘》，頁 198。

¹²² 張宣武，〈韓復榘叛馮投蔣與蔣介石拿辦韓復榘見聞點滴〉，山東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 17 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4 年），頁 148。

¹²³ 呂偉俊，《韓復榘》，頁 95。李新總編的《中華民國史》一書，或參考呂偉俊書，過程描述略同。參見李新主編，《中華民國史》，第 3 編第 2 卷，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頁 200。

¹²⁴ 參見《蔣中正檔》，特交文電—共匪禍國，〈武裝叛國（二十八）〉、〈武裝叛國（二十九）〉諸電文。

震面商。¹²⁵ 10月5日，商震與劉峙在開封會面，商討軍隊集結事（及至此時，調動商震軍一事皆在商議階段），¹²⁶ 以上過程或被是時相關人士解讀為蔣要大舉攻韓之跡象，故衍生出上述種種蔣布署之猜想。馮玉祥在日記便謂10月5日吳古月、劉哲熙向其談到蔣要武力解決韓，¹²⁷ 復可推知此為當時韓、劉雙方相關人員預測蔣行動之耳語。此外，相關回憶人士日後皆身處共產黨政權下，或有意表現蔣窮兵黷武形象。故蔣欲武力解決之說法，不可盡信。蔣有意動武，應在調停無效之後，且非主要手段。

三、竭力忍受與戰事完結

10月24日，蔣中正命令商震準備入魯之後，終究沒有動武，其原因為何？事實上，蔣在16日已透露其心態：「粵陝魯各事皆可使政局隨時動搖，余惟有照預定方針，而先整頓範圍所及之區而已。蓋劃定範圍，把握重心，而集中時間與精力以為之是為科學辦事之方法，吾身體而篤行之可也。」¹²⁸ 蔣的預定方針與整頓範圍，即為豫鄂皖三省之剿共戰爭，據此可知蔣內心並不想強力介入膠東戰事。19日，蔣謂：「我中央如能專心整頓內部，確定不參加內戰政策，則對內對外皆有餘裕，不僅反動內奸無敢跋扈，及強敵暴寇亦無如我何也。」¹²⁹ 可知蔣根本不想「武力解決」而參加內戰。中央調停無效而膠東戰事擴大後，21日，蔣謂「韓復榘不遵命，急欲予以制裁。但余既有預定方針，且準備亦未完事，何可因小不忍而亂大謀乎？忍之忍之，姑使此劣徒在魯，以作掩護，可暫免倭寇之妒嫉而着急也。」¹³⁰ 是蔣雖想設法制裁韓復榘，但受限剿共之預

¹²⁵ 「蔣中正電示劉峙與商震面商並令其部隊設法集結」（1932年10月1日），〈統一時期（七十二）〉，籌筆—統一時期，《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200072003。

¹²⁶ 商震記與劉峙相商情形，謂：「21（年）10（月）5（日）順德。急。牯嶺總司令蔣鈞鑒：密。震於今午抵順，昨午由鄭赴汴，謁經扶〔劉峙〕兄。渠對職部集結一節，頗表同意，俟有接防部隊到，著即可照辦。」參見「商震電蔣中正與劉峙接談經過及韓復榘代表靳文溪到順德」（1932年10月7日），〈民國二十一年（六）〉，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58099。

¹²⁷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3冊，1932年10月5日記事，頁703。

¹²⁸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17》，1932年10月16日記事，頁150。

¹²⁹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17》，1932年10月19日記事，頁167。

¹³⁰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17》，1932年10月21日記事，頁180。

定方針，只得默許韓在山東獨大。蔣在此心態指導之下，雖欲維護中央威信，實則只能一退再退。

有謂蔣原欲動武，因張學良支持韓復榘而不可行，¹³¹ 劉珍年副官臧義和甚至回憶張學良以劉珍年狂妄，囑咐韓復榘「相機除之」；韓向劉開戰以缺乏重武器為慮，張則「慨允助以炮兵一團，並且先令一營開到魯境。」¹³² 張學良究竟有無在戰事中助韓？相關記載不可謂少，¹³³ 以非本文討論範圍，暫且不論，¹³⁴ 而張學良助韓導致蔣不敢動武之說，本文認為可再商榷，原因有下列數端：第一、依上文論證，動武並非蔣在事發以來之處理方針，故蔣原欲動武，受張助韓之壓力所阻，出發點已有謬誤。第二、蔣中正在戰事一開始便十分重視張學良之動向（詳前），若東北軍以一個團的兵力助韓，且一個營的兵力已先調動，當可為蔣獲知。然筆者於《蔣檔》中並未見到此則情報，且蔣在

¹³¹ 安作璋主編，《山東通史》現代卷，上冊（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109；黃偉，〈論 1932 年山東「韓劉衝突」的制約因素〉，頁 88。

¹³² 臧義和，〈軍閥劉珍年的興滅〉，收入《文史資料存稿選編》，晚清、北洋、下，頁 932。

¹³³ 如高蘭謂：「1932 年 9 月，韓在張學良的炮兵支持下，向盤據在膠東的劉珍年第二十一師發動進攻，迫使蔣把劉師調往浙江。」高蘭，〈韓復榘生平事略〉，頁 19。又如《民國軍事史略稿》載「至 11 月上旬，張學良為了支援韓復榘，從駐防津浦線的王樹常軍派出一營重砲兵化裝成韓軍前來支援。」姜克夫編著，《民國軍事史略稿》，頁 115-116。然而，當時日人也謠傳膠東之戰係「東北軍〔張學良〕消滅西北軍〔韓復榘〕之計劃實現。」參見「陳立夫電蔣中正平津方面日人對魯事之各項謠傳」（1932 年 9 月 23 日），〈民國二十一年（四）〉，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56137。

¹³⁴ 《閻錫山檔案（閻檔）·各方往來電文錄存》，為山西軍政首長閻錫山指示其下屬截留之各方往來電文，可藉此窺見當時軍政大員之往來情形，獲知許多未公開的互動、評論、情報等。其中民國 21 年 9、10 月間之往來電文錄存，截留許多東北海軍將領沈鴻烈（時駐青島）與張學良之電文，可清楚看到東北軍雖較同情韓復榘，但的確對韓、劉之爭無所偏倚，盡量避面捲入內戰漩渦。且張學良方因熱河戰事遭受國人責難，與汪兆銘關係空前惡劣，當希冀獲得蔣中正的支持，豈會暗中助韓與蔣為敵？至於韓復榘發動戰事前曾與張會面，結果頗為良好，為韓發動戰事之憑藉，是否意指張曾答允助韓？筆者以為，張不見得有任何承諾，但從其之後對韓並無大動作阻遏來看，可視為韓判斷準確——張不成助力，亦不成阻力。要之，筆者傾向張學良並未直接助韓，因異說仍多，尚難確證，故姑將此說置於腳註，留待日後發掘更多史料再做深談。參見國史館藏《閻錫山檔案》之〈各方民國 21 年 9 月往來電文錄存〉、〈各方民國 21 年 10 月往來電文錄存（一）〉、〈各方民國 21 年 10 月往來電文錄存（二）〉。

內戰過程中，屢與張學良相互溝通，¹³⁵ 對戰事之感想，從未提及擔心張助韓。可說不是張未助韓，便是蔣未收到此訊息，不管為上述何者，張助韓之說都無從影響蔣的判斷。第三、10月15日，劉珍年便曾電蔣問韓復榘的飛機是否為東北軍海軍將領沈鴻烈提供，張學良是否助韓？¹³⁶ 蔣問張，張覆電稱對韓、劉無所偏袒。¹³⁷ 蔣乃將此電轉知劉：

頃接張漢卿電告，據沈鴻烈司令呈復，稱自劉軍移駐掖縣，屢次去電均經退回。山東省府前因剿匪關係，曾借去飛機一架，已準備飛行，所謂兩架者，或係該機之誤會。又職部駐防煙台、龍口，只以暫維地方治安為限，所謂扣留郵電各節，想係公安局所為，而煙、龍公安局長，則均係韓方所派，雖欲強令不扣，亦有為難。職部在沿海各口，確皆嚴守中立，以免捲入漩渦，事實具在，想劉亦自能探悉等語。漢卿並謂查韓借去海軍之一架飛機，馬力形制均小，斷不勝投彈之用，但此時索還，事實上或不無困難。已飭沈司令盡力設法，並可負責保沈一切謹守範圍無所偏袒云云。¹³⁸

觀蔣知照劉珍年此電，知張學良意態對蔣的確重要，然其已明確向蔣表明將不會有所偏倚。綜合上述，張學良助韓之說即便屬實，在蔣看來或屬捕風捉影，或屬不重要（因其本不想武力解決），應不至於影響蔣動武決策。

10月20日，韓復榘表面上以無法解救膠東人民於水火，實際上欲以退為進，威脅中央調走劉部，宣布辭去本兼各職。¹³⁹ 蔣見魯事將因此更形複雜，¹⁴⁰

¹³⁵ 如張學良10月22日於北平呈蔣一電，報告韓復榘動態及華北局勢。參見「張學良電蔣中正謂韓復榘囑劉熙衆面告請鈞座將劉珍年部調離魯境否則只有個人引退」（1932年10月22日），〈民國二十一年（八）〉，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60119。

¹³⁶ 「劉珍年電蔣中正聞韓復榘之飛機為沈鴻烈所借給請示張學良是否助韓」（1932年10月15日），〈民國二十一年（七）〉，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59092。

¹³⁷ 「張學良電蔣中正據沈鴻烈稱確借韓復榘飛機一架又煙台龍口扣留郵電想係韓派員所為」（1932年10月19日），〈民國二十一年（八）〉，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60043。

¹³⁸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17》，1932年10月20日記事，頁178-179。

¹³⁹ 張同新編著，《蔣汪合作的國民政府》（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39。國聞週報謂韓引退之動機，係「軍政部解決膠東問題辦法中，為劉部規定防區，並將煙台龍口一併劃歸劉部防區之內。」國聞週報社輯，《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電行政院慰留。¹⁴¹ 其內心實希望改派文人為山東省政府主席，故電問何應欽有誰可派？¹⁴² 同時，蔣動作頻頻，欲分化韓復榘手下重要將領，電蔣鼎文謂：「請以吾弟名義，派員往兗州或濟甯孫桐萱師長所駐之地與之聯絡，並便中探其對中央態度如何。惟派去之人須絕對穩重練達，不可稍涉魯莽唐突為要。對魯其他各師長分頭聯絡之法，并請與李師長協商而行。」¹⁴³ 電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陳立夫謂：「聞凌百對孫桐萱、曹福林、谷良民等頗有交誼，請問其可否赴魯聯絡試探孫、曹、谷等對於中央與韓之態度。但此事關係異常重大，務須十分慎重，不可稍涉輕率或唐突為要。」¹⁴⁴ 蔣雖欲施展分化策略，但此時韓、劉之爭韓部優勢明顯，且蔣未在戰事一爆發便行之，似稍嫌晚（蔣做出分化決策後，不到 10 天，戰事便結束），故未見成效。且此時（22 日）蔣思索之對韓辦法為「一、雙方調離魯境；二、派一部往魯；三、任韓放肆」，¹⁴⁵ 其中竟有「任韓放肆」一項。蔣自解為「國家大事，不可任性草率，必權衡輕重緩急而適宜處之」，¹⁴⁶ 即對韓妥協退讓之心已定。25 日，在韓復榘猛攻之下，劉珍年部難支，電蔣懇請飭令韓部撤兵，並願調離山東。¹⁴⁷ 是日，蔣誌所感曰：「大小軍閥處於今之危局，尚孜孜謀思利而毫不顧念黨國，痛憤何如。」又歎曰「對魯事決放任不顧，一切『竭力忍受』，以期達我剿匪之目的可也。」¹⁴⁸

第 9 卷第 43 期，頁 6，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3 編第 7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 年），頁 4128。足見韓請辭真意在威脅中央澈底去劉。

¹⁴⁰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 17》，1932 年 10 月 22 日記事，頁 192。

¹⁴¹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 17》，1932 年 10 月 23 日記事，頁 195-196。

¹⁴²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 17》，1932 年 10 月 23 日記事，頁 195-196。

¹⁴³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 17》，1932 年 10 月 22 日記事，頁 188-189。

¹⁴⁴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 17》，1932 年 10 月 22 日記事，頁 189。

¹⁴⁵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 17》，1932 年 10 月 22 日記事，頁 186-187。

¹⁴⁶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 17》，1932 年 10 月 22 日記事，頁 186-187。

¹⁴⁷ 「劉珍年電蔣中正懇飭令韓復榘撤兵及調該師離山東至易於制韓之地區」（1932 年 10 月 25 日），〈民國二十一年（九）〉，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61039；「陳誠電蔣中正劉珍年急求調離魯境」（1932 年 10 月 25 日），〈民國二十一年（九）〉，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61040；「朱培德電蔣中正劉珍年表示願速離魯境」（1932 年 10 月 25 日），〈民國二十一年（九）〉，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61041。

¹⁴⁸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 17》，1932 年 10 月 25 日記事，頁 218-219。引號為筆者所加。

於是中央與韓再度會商善後事宜，蔣聲言如韓確能遵令停戰撤兵，並今後能矢誠服從中央，則調劉離魯不成問題。¹⁴⁹ 韓確定劉將調走後，同意在訂定劉部離魯期限及中央派員監督之條件下，撤兵停戰，¹⁵⁰ 而此也算「維護中央威信」，給蔣臺階下。蔣乃於 29 日去電韓慰勉：「吾兄體念中央、共維大局之忱，方深欣慰。頃誦來電，肫誠若揭，感佩尤深，中與吾兄夙同肝膽，無間始終，相與之誠，早信之于平日，固不以造次而有異也。」¹⁵¹ 蔣雖對韓十分痛惡，但仍以此電安撫之，將事變能結束視作韓「體念中央、共維大局」所促成。11 月 2 日，何應欽下達三項命令，指示劉軍撤離過程細節。¹⁵² 7 日，韓部停止炮擊，8 日，開始撤退。¹⁵³ 9 日，蔣再度去電韓嘉勉：「肫誠充溢，感佩如何。膠東之事既已轉禍成祥，實為國家之福，我輩此後唯有益相奮勉，協力挽救，以期早紓國難，想兄於此亦必有同感也。」¹⁵⁴ 膠東戰事，便在蔣一退再退、「竭力忍受」中，以韓復榘全勝告終。而失去地盤的劉珍年，移駐浙東，¹⁵⁵ 再調江西剿共，¹⁵⁶ 部隊分崩離析，¹⁵⁷ 最後以駐膠東時縱兵殃民的罪名（即韓復榘發動戰爭對外宣稱之理由），於 1935 年 5 月 13 日槍決於南昌。¹⁵⁸

¹⁴⁹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 17》，1932 年 10 月 27 日記事，頁 223-224。

¹⁵⁰ 《大公報》，天津，1932 年 10 月 27 日，版 3。

¹⁵¹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 17》，1932 年 10 月 29 日記事，頁 231-232。

¹⁵² 何應欽上將九五壽誕叢書編輯委員會編，《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上冊（臺北：編者印行，1984 年），頁 270-271。

¹⁵³ 「劉珍年電蔣中正棲霞城韓部已撤餘仍在原陣地未動七日始行停止砲擊」（1932 年 11 月 8 日），〈民國二十一年（十）〉，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62004。

¹⁵⁴ 王正華編註，《事略稿本 17》，1932 年 11 月 9 日記事，頁 322。

¹⁵⁵ 「蔣中正電囑浙江省查報劉珍年部分駐地點」（1933 年 2 月 14 日），〈統一時期（七十七）〉，籌筆—統一時期，《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200077043。

¹⁵⁶ 劉操，〈蔣介石宰割劉珍年部的片斷〉，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政人物、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 年），頁 745。

¹⁵⁷ 劉部一個營於 1933 年春在泰順發生兵變，其後旗下張鑾基旅脫離建置。參見「朱培德唐生智電蔣中正請准張鑾基旅脫離劉珍年師」（1933 年 4 月 12 日），〈民國二十二年（五）〉，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75104；臧義和，〈軍閥劉珍年的興滅〉，頁 933。

¹⁵⁸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31—民國 24 年 5 月至 7 月（上）》（臺北：國史館，2008 年），1935 年 5 月 13 日記事，頁 81；李仙洲，〈劉珍年的起家與失敗〉，頁 163。

伍、結 論

膠東之戰爲民國以來內戰之又一遭，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欲將勢力擴展至整個山東半島，乃以爲民除害爲藉口，武力驅逐盤據膠東的第二十一師師長劉珍年部。進一步分析，此戰事發生之遠因爲韓欲澈底解決心腹之患劉珍年，以及膠東富裕，且有海口，劉稅收不上繳省庫，故韓欲直接占領。導火線爲因中央協餉問題雙方齟齬，有權力、意氣之爭。至於韓復榘發動戰爭之考慮，概略有三：一、是時國家內憂外患，尤其國聯報告書將次發表，全國輿論一致對外，韓料定蔣中正不敢擴大內戰；二、戰前韓與掌握華北軍政的張學良會面，結果頗爲良好，故認爲短時間解決劉部，張學良方面應無問題；三、韓部兵力大於劉，爲韓判斷能短時間內解決劉部之依據。

戰爭發生前後，掌握中央實權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關懷之事有四，一爲日本進犯，二爲共黨問題，三爲汪兆銘「以退爲進」、「有所要脅」，四爲胡漢民與西南問題。在此背景下，蔣在事發之初對韓、劉無所偏倚，先求調查清楚，並有相應布置：一、徵求張學良、汪兆銘等軍政大員的意見；二、派員詳查韓、劉軍事實力，並指示情報人員全力活動；三、要求第九師集中，增加偵查兵力，加強準備，以防萬一；四、請與劉珍年有舊之第十八軍軍長陳誠，詢問劉珍年狀況並申明中央立場。在清楚戰況後，蔣對劉請其忍讓，對韓則軟硬兼施；一來請韓顧全大局，停止內戰，一來以軍委會名義嚴令停戰撤兵，待中央派員調查。同時，蔣派員製造輿論，期望以此壓迫韓復榘停止軍事行動。9月底，韓復榘停戰，情勢似有轉圜。蔣除派員調解，下令執行停戰撤兵的第一步指令外，因受局勢壓迫，處置方針趨向退讓，冀望韓理解中央維護威信之立場。然韓復榘以驅逐劉珍年之目標未達，又得放棄所獲，故無法接受中央方案，且韓與日人有所聯繫，冀望輿論抑遏韓停止內戰一致對日，效力有限。於是韓雖一度停戰，之後仍展開更大規模之攻勢。

蔣對調停膠東之戰，原有相當把握，但戰事遷延擴大後，受限於一、外交上，國聯開會討論九一八事變中國對日之指控，日本以中國本就處於分崩離析局面，爲自己出兵合理化，蔣若此時加入內戰，將坐實日本指控，也無法獲國人諒解；二、國內派系不協，行政院長汪兆銘以熱河戰役張學良不抵抗請辭，

國民黨元老胡漢民亦在西南與中央分庭抗禮，蔣不欲山東戰事令政治再起更大波瀾；三、蔣是時確立攘外必先安內之政策，決定首先處理共黨問題；時蔣親任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投入重兵「剿匪」，不欲再分兵投入另一場內戰。於是蔣一開始便沒有「武力解決」之打算，對魯戰冀望於軍政人員之調停與輿論之壓迫；然而，對於沒有實力後盾的調停方式，顯然難具成效。其後蔣雖一度有意動武，且欲分化韓復榘部核心將領，卻未用力且屬太晚。於是在中央保證劉珍年部調走之前提下，韓復榘停戰撤兵，也算維護了中央威信。膠東之戰便以韓復榘得遂行其驅逐劉珍年、獨霸山東之目標告終。

西北軍將領張宣武回憶膠東之戰謂：「蔣介石命劉峙集中五個師，陳兵徐州，擺出威脅山東的架勢……由於輿論的壓力，蔣介石不得不把劉珍年調離山東。」¹⁵⁹ 分析蔣中正對膠東之戰的處置，知其並非在全國壓力下由武力解決轉為調停，上述說法應可修正，而過去陳述這段歷史，多立基於相類看法的回憶文章，應可一併修正。¹⁶⁰ 蔣非窮兵黷武之人，其運用手段（調停、輿論、分化等），考量亦廣，未迷信武力。

以韓、劉及蔣三方立場進行分析，劉珍年無疑為最大輸家，其下場為軍閥政治之現實，失去參養軍隊的地盤，即失去政治籌碼，任人宰割；¹⁶¹ 韓復榘無馮玉祥等黨、政、軍要員之支持，且在國人一致反內戰的輿論下，竟囊括一切，可見其抓住時機獲取政治利益之敏銳。被迫捲入戰事的蔣中正，內心極想

¹⁵⁹ 張宣武，〈韓復榘叛馮投蔣與蔣介石拿辦韓復榘見聞點滴〉，頁 148。

¹⁶⁰ 如朱銘、王宗廉主編，《山東重要歷史事件》，第 6 卷：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177；呂偉俊，《韓復榘》，頁 95；李新主編，《中華民國史》，第 3 編第 2 卷，上冊，頁 200。

¹⁶¹ 李君山，〈一九三五年「華北自治運動」與中國派系之爭——由《蔣中正總統檔案》探討戰前中日關係之複雜性〉，《臺大歷史學報》，第 34 期（2004，臺北），頁 245。學者陳進金研究兩湖事變，提出一重要問題：「何以蔣介石致力於和平的方案，總是得不到地方軍人的信任？」陳進金，〈挑戰中央：兩湖事變期間桂系軍人的和與戰〉，收入黃寬重主編，《基調與變奏：七至二十世紀的中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等，2008 年），頁 370。劉珍年的下場或可提供解答，亦即接受和平方案（誠然，劉珍年乃無法支持而接受之），以致失去地盤乃至於軍隊，下場恐怕難得善終；明乎此，孰願束手就降？學者陳志讓亦提到一失去兵權，軍閥自己生命財產將有危險，謂「『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軍閥帶兵是一種騎虎不能下背的局面。」參見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96。

制裁韓，但受制局勢，處置日趨退讓。即便山東近鄰京畿，與蔣直轄的大批剿匪部隊距離不遠，韓部兵力也遠無法與中央軍抗衡，但蔣對魯事之處理，竟一如對西南偏遠省份，無法插足太多。¹⁶² 蔣之處置膠東之戰，考量核心非救民於水火，亦非扶植劉珍年抗韓，而是維護中央威信。故即便早有調劉離魯之考量，仍不動聲色，定要韓接受停戰撤兵之第一步處置再做第二步之商議，韓乃無法接受中央調停，不顧一切猛攻劉部。蔣雖因此一度有意武力解決，在劉部不支，自請調走之後，仍馬上妥協。我們可以說，蔣維護中央威信之努力，不甚成功，韓最終之停戰撤兵與其說是維護中央威信，毋寧為接受戰利品前的退讓。如是情態，時任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左路軍司令官何成濬的重要幕僚華覺明評論曰：

韓既不顧一切，抱澈底解決劉部之勇氣，而劉又誓死抵抗，誠恐韓、蔣感情因之漸隔膜，華北前途未可樂觀。¹⁶³

蔣、韓在戰後雖未撕破臉，然韓對蔣威信的挑戰，以及戰後建立「山東王國」，對以日本侵華為背景的華北局勢，或有一定影響。¹⁶⁴ 1934、5 年，日人倡華北自治時，蔣便曾留下「魯韓態度可慮」之記載。1937 年 8 月 1 日，蔣中正在日記亦謂：

魯韓態度之驕矜，藐視無規，仍令人疑懼，惟願上帝佑我中華，抗倭時期內不發生叛變而已。¹⁶⁵

職是之故，1932 年的膠東之戰對探討日後華北局勢之變化，應有一定意義，值得論者留意。

¹⁶² 楊維真，〈從羈縻到控制：論蔣介石對貴州地方勢力的處置（1927-1935）〉，收入黃寬重主編，《基調與變奏：七至二十世紀的中國》，頁 392。

¹⁶³ 「北平華覺明致漢口何成濬東電」（1932 年 10 月 1 日），〈各方民國 21 年 10 月往來電文錄存（一）〉，《閻錫山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116-010108-0214-085。

¹⁶⁴ 吳錫祺，〈韓復榘被扣目擊記〉，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 18 輯（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頁 165。

¹⁶⁵ 轉引自呂芳上，〈「最後關頭」已到：1937 年「蔣中正日記」的考察〉，收入李君山等編，《榮耀的詩篇：紀念抗戰勝利 60 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防部部長辦公室，2006 年），頁 166。

徵引書目

一、檔案

《閻錫山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各方民國 21 年 9 月往來電文錄存〉。

〈各方民國 21 年 10 月往來電文錄存（一）〉。

〈各方民國 21 年 10 月往來電文錄存（二）〉。

《國民政府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山東韓復榘劉珍年二部戰爭案（一）〉，國防（軍事）—戰役—軍閥戰爭。

《蔣中正總統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統一時期（七十一）〉，籌筆—統一時期。

〈統一時期（七十二）〉，籌筆—統一時期。

〈統一時期（七十七）〉，籌筆—統一時期。

〈地方團隊（一）〉，特交檔案—分類資料—軍事。

〈民國二十一年（四）〉，特交檔案—一般資料。

〈民國二十一年（五）〉，特交檔案—一般資料。

〈民國二十一年（六）〉，特交檔案—一般資料。

〈民國二十一年（七）〉，特交檔案—一般資料。

〈民國二十一年（八）〉，特交檔案—一般資料。

〈民國二十一年（九）〉，特交檔案—一般資料。

〈民國二十一年（十）〉，特交檔案—一般資料。

〈民國二十一年（十三）〉，特交檔案—一般資料。

〈民國二十二年（五）〉，特交檔案—一般資料。

〈民國二十五年（七）〉，特交檔案—一般資料。

〈武裝叛國（二十七）〉，特交文電—共匪禍國。

〈武裝叛國（二十八）〉，特交文電—共匪禍國。

〈武裝叛國（二十九）〉，特交文電—共匪禍國。

〈領袖指示補編（一）〉，特交文電—領袖事功—領袖指示。

吳淑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14—民國 21 年 4 月至 5 月》。臺北：國史館，2004 年。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16—民國 21 年 8 月至 9 月》。臺北：國史館，2004 年。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17—民國 21 年 10 月至 12 月》。臺北：國史館，2005 年。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31—民國 24 年 5 月至 7 月（上）》。臺北：國史館，2008 年。

二、報紙

《大公報》，天津，1932 年 9-10 月。

《中央日報》，南京，1932 年 9-10 月。

《申報》，上海，1932 年 9-10 月。

《益世報》，天津，1932 年 9-10 月。

三、專書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一代梟雄韓復榘》編輯組編，《一代梟雄韓復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 年。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 3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

安作璋主編，《山東通史》，現代卷，上冊。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4 年。

朱銘、王宗廉主編，《山東重要歷史事件》，第 6 卷：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 年。

何應欽上將九五壽誕叢書編輯委員會編，《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上冊。臺北：編者印行，1984 年。

呂偉俊，《韓復榘》。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 年。

李新主編，《中華民國史》，第 3 編第 2 卷，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姜克夫編著，《民國軍事史略稿》。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 2 卷。臺北：出版者不詳，1978 年。

國民政府秘書處編輯，《國民政府公報》，第 39 冊，洛字第玖號，中華民國 21 年 5 月 31 日。臺北：成文出版社，1972 年。

國聞週報社輯，《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第 9 卷第 38、39、43 期，收入沈

- 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3編第7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
- 張同新編著，《蔣汪合作的國民政府》。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 曹劍浪，《中國國民黨軍簡史》，上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0年，第2版。
- 許育銘，《汪兆銘與國民政府——1931至1936年對日問題下的政治變動》。臺北：國史館，1999年。
- 陳公博，《苦笑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
- 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
- 新銘，《國軍軍史：軍級單位戰史》。臺北：知兵堂出版社，2007年。
- 楊天石，《蔣氏密檔與蔣介石真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
- 臧運祜，《七七事變前的日本對華政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年。
- 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八到七七》。臺北：國史館，1995年。
- 劉鳳翰，《戰前的陸軍整編——附九一八事變前後的東北軍》。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2年。
- 劉鳳翰，《國民黨軍事制度史》，下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
- 蔣作賓，《蔣作賓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
-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二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四、論文及專文

- 于翔麟，〈民國人物小傳：劉珍年〉，《傳記文學》，第55卷第2期（1989年8月），臺北。
- 王程遠，〈張宗昌與劉珍年牟平城區之戰〉，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煙台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煙台文史資料》，第4輯。煙台：編者印行，1985年。
- 王華岑，〈跟隨馮玉祥在泰山〉，收入山東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14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

- 王贊亭，〈馮玉祥兩次隱居泰山見聞片段〉，收入山東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 10 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 年。
- 吳錫祺，〈韓復榘被扣目擊記〉，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 18 輯。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
- 呂芳上，〈「最後關頭」已到：1937 年「蔣中正日記」的考察〉，收入李君山等編，《榮耀的詩篇：紀念抗戰勝利 60 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放部部長辦公室，2006 年。
- 呂芳上，〈抗戰前的中央與地方——以蔣介石先生與廣東陳濟棠關係為例（1929-1936）〉，《近代中國》，第 114 期（2001 年 8 月），臺北。
- 李仙洲，〈劉珍年的起家與失敗〉，收入山東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 10 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 年。
- 李正言，〈劉珍年獨霸膠東〉，收入《煙台文史資料》，第 3 輯。煙台：編者印行，1984 年。
- 李君山，〈一九三五年「華北自治運動」與中國派系之爭——由《蔣中正總統檔案》探討戰前中日關係之複雜性〉，《臺大歷史學報》，第 34 期（2004 年 12 月），臺北。
- 李扶漢，〈北洋軍閥膠東王劉珍年〉，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政人物·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 年。
- 紀慧亭，〈韓復榘主魯政聞〉，收入山東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 14 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3 年。
- 高蘭，〈韓復榘生平事略〉，收入中國政治協商會議青島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 2 輯。青島：編者印行，1982 年。
- 張宣武，〈韓復榘叛馮投蔣與蔣介石拿辦韓復榘見聞點滴〉，收入山東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 17 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4 年。
- 陳紅民，〈胡漢民·西南政權與廣東實力派〉，《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37 卷第 1 期（2007 年 1 月），杭州。
- 陳進金，〈挑戰中央：兩湖事變期間桂系軍人的和與戰〉，收入黃寬重主編，《基調與變奏：七至二十世紀的中國》。臺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等，2008 年。
- 黃偉，〈論 1932 年山東「韓劉衝突」的制約因素〉，《民國檔案》，2008 年第 4 期（2008 年 11 月），南京。
- 楊維真，〈從羈縻到控制：論蔣介石對貴州地方勢力的處置（1927-1935）〉，收入黃寬重主編，《基調與變奏：七至二十世紀的中國》。臺北：國立政治大

學歷史學系等，2008 年。

臧義和，〈軍閥劉珍年的興滅〉，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晚清・北洋・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 年。

趙延慶，〈近代軍閥中的奇特人物——劉珍年〉，收入山東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 30 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 年。

劉一青，〈憶說膠東王劉珍年〉，《中外雜誌》，第 29 卷第 5 期（1981 年 5 月），臺北。

劉操，〈蔣介石宰割劉珍年部的片斷〉，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政人物・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 年。

魯濤，〈劉珍年在煙台〉，收入山東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 17 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4 年。

韓洞，〈膠東之戰〉，收入山東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一代梟雄韓復榘》編輯組編，《一代梟雄韓復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 年。

